

源与变—古歌部的历时发展

Sources and Changes – Diachronic Development of Ancient Ge (歌) Rhyme

林素卉*
(Lim Su Hui)

摘要

论文以段玉裁古音十七部的歌部为研究原点，通过各家对古音的拟测以及中古《集韵》和《广韵》的反切，作为语音分合的道路，加上现代方言的相互对照，双线比较后描绘语音的演变路线。方言材料以闽语方言和山西方言为主，视作南北方音的对比，发现两地方音在部分字音上有相当近似的音读，而判定语音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歌部在各家的上古音分部上，属于较无争议的韵部，但有部分学者将之与支部结合，归作一类。不可否定的是，歌部与支部关系密切，在现代方言当中还能找到语音交融的例子。上古以后，歌部入歌戈麻韵，语音的分化趋逾复杂，方音的异读是最有效的线索，去探求语变的轨迹。通过比较“也、蛇”音读，发现支部和麻韵音变的“链移”¹情况。从“麻”得声的字组，音变情况相当复杂，但与中古韵部反映契合。以“罗、果”得声的字组，各方言语音韵部开合口没有一致性，故认为其语音分裂最早的起点主要元音很可能是o。

关键词：歌部、方言层次、音变、比较法

Abstract

The thesis takes Ge (歌) rhyme from Duan Yucai's seventeen-segment ancient rhymes as the origin of research. Through the simulation of ancient tone by different experts and the fanqie (反切) of “Ji Yun” and “Guang Yun” of the Middle Ages, it serves as the path of phonetic sepa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tones. This coupled with the cross reference of modern dialects enables the two-line comparison which depicts the evolution of tone changes. The dialect materials are mainly Min dialect and Shanxi dialect, which are regarded a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tones. It is found that the two local sounds have

* 林素卉 高级讲师Senior Lecturer, 电邮地址: suhui.lim@newera.edu.my

¹ 参考王福堂, 2005, 《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 北京: 语文出版社, 页16。 “链移指音系中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上具有某种关系的多个音类, 既声母、韵母或声调, 向着同一方向变化, 而大致保持彼此原有的关系, 表现为A变成B, B变成C, C变成D等, 或B变成A, C变成B, D变成C等。这种音变并不是成组的语音成分的同步变化, 而是不成组的语音成分连成一个系列作递进式的变化, 所以也称为音移。”

fairly similar in part of their phonetic tones, and this determines that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nunciation has certain regularity.

Ge (歌) rhyme belongs to the uncontroversial rhymes in the ancient tone divisions of various families, but some scholars have combined them with Zhi (支) rhyme and classified them as one category. It is undeniable that Ge (歌) rhyme and Zhi (支) rhyme are closely related, and examples of phonetic blending can still be found in modern dialects. Since ancient times, Ge (歌) rhyme belonged to Ge Ge Ma (歌戈麻) rhyme,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unds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The different pronunciations of dialects are the most effective clues to explore the trajectory of tone changes. By comparing the pronunciation of “Ye (也), She(蛇)”, the “chain shift” can be found in the tone changes of Zhi (支) rhyme and Ma (麻) rhyme. From the word group of “Ma (麻)”, the sound change is quite complicated, but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iddle Ancient rhymes. In the group of words with “Luo (罗) and Guo (果)”,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phonological rhyme of the dialects are not consistent. Therefore,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earliest starting point of the phonetic split is most likely the main vowel — O.

Keywords: Ge (歌) rhyme, Dialect layer, Tone change, Comparison method

一、前言

汉文字古音研究，多着重在文献与文献纵向的比较，较少使用方言与方言间横向比较，故在同质假设的理论上，对语言的例外现象只能诸多猜测，缺乏一道明确的音变轨迹。论文受张光宇对“皮”为中古止摄开口三等字，同“菠、过、火”中古果摄合口一等字在潮汕方言读同音[-ue]（参考张光宇2003：98），去解释“皮”字在中古音韵名目上的例外现象而得到启发，故将尝试以方言的角度，去探求段玉裁古音第十七部歌部的语音演变情况。

古音十七部当中，歌部是多位学者拟音上较有共识的韵部，他们根据《诗经》押韵、先秦诸子散文、东汉许慎《说文》谐声和假借字等材料，再连接中古《切韵》的韵部分化，构拟出完整的古音系统。其中歌部的主要元音一般被认为是舌面低元音A（因各家的构拟略有不同，使用符号各异，这里以A表示歌部的元音为低元音），到中古《切韵》时期大部分字为歌、戈韵，小部分字分化入麻韵，虽然分化到不同韵部，大部分学者认为主要元音依然保持在地域的A类。

其次，歌支是否分部学者亦有异议，高本汉、李方桂、董同龢将支部与歌部合并，陆志韦使用《切韵》及《广韵》的韵部上推古音不做分部，林语堂延续前人的分部，只针对几个韵部做讨论，而罗常培、周祖谟很清楚的说明，“西汉时期歌支两部的读音是很接近的，很像是并为一部。但是歌部字可以跟鱼部字押韵，而支部字绝不跟鱼部字押韵，足见歌支两部还不能就做为一部看待。所以我们还把它分为两部。”（罗常培、周祖谟2007：26）足以见得，段玉裁将歌部和支部分开，但注明古合韵，是了解到鱼歌支的相互关系。以下载段玉裁对歌支两部的说法：

第十六部支佳韵音转入于脂齐歌麻。第十七部歌戈韵音转亦多入于支佳，此音转之大较也。

支者音之正也，佳者支之变也。歌戈者音之正也，麻者歌戈之变也。

（《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一）

足以见得段玉裁清楚古音分合来龙去脉，但未必知晓语音如何演变，只能以“大略古音多敛，今音多侈”（《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一）去盖括。

除了拟音和分部的分歧，对于语音演变的时间和空间上，各家也有不同的看法。高本汉认为反映雅言的《诗经》和六世纪陆法言的《切韵》都属于北方的标准语，在有序同质体系下构拟出了一套标音准确的语音系统，而李方桂和董同龢在高本汉的系统上稍加修改，更进一步完成中古与上古的音系模型。林语堂和陆志韦认为上古就有方言的分歧，在古合韵以及谐声的基础上，使用语音学的方法拟定了一套能够符合语音变化的语音系统。另外，虞万里从《诗经》十五国风、《楚辞》、周秦韵文、两汉至《切韵》的成书地点和个别作者用韵情况，考察歌支的通押，认为“周秦以及以后各时代都有雅言和方言同时并存。”（虞万里1994：289）

若以今视古，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皆不是从上古一直直系继承的同质体系，特别是闽语的文白异读，现有相当多的研究报告探讨其层次问题。北方方言虽然文白很少，但北京音系“尴尬”[kan ka]不读[tɕien tɕie]，属于误读，其语音是来自吴语。因此，以方言同方言相互对比或单一方言的内部比较，再配合古音的分化，以作为探索语音演变的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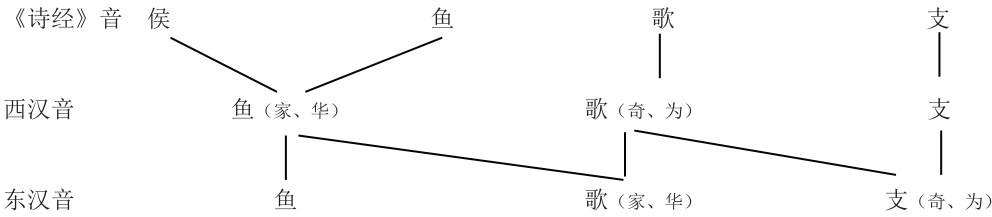
方言材料部分，南方采用闽语语料，北方采用北京话和山西方言材料。以张光宇对闽方言形成做的研究，说到：“经由层次剖析可以明确看出闽方言的形成历经西晋、南朝和唐宋三个阶段，类型特点包括中原东部、中原西部、江东吴语、长安文读。”

（张光宇1996：16）因此研究古音，多半从闽方言着手，这里也不例外。至于山西，是中华文明起源地黄河流域的西部地区，属于中原核心至东北部，地理位置有很大部分是山区，于黄土高原之上。一般认为，交通不便的山地，语言保存情况会比交通方便的平地更为古老完整，另外山西方言有晋语区，保留了许多入声字，是北方方言中较为保守的部分，而且山西方言有文白异读的情况，因此认为山西方言也是考察古音的上层材料。

二、歌部的历时音变与各家的拟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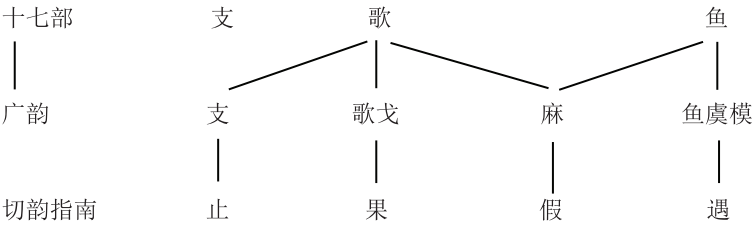
对于上古音，自清代学者开始，对古音系统就有相当规模的研究，但当时中国还没有音系学这一类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因此，当时学者对古音所能采取的，就是使用文献数据做对比，通过韵文押韵、通假字、谐声字和韵书，对古音做音类的分部。段玉裁将古音分为六类十七部，以古合韵的多寡来排列古音的次序，而可以知道古音第十七部歌韵和第十六部支韵有不少合韵情况，歌部的研究，必定会和支部有所重迭。至于鱼部，根据不同时代的韵文押韵情况，不少学者认为歌部是从鱼部分化出来，到了两汉，鱼歌已经确立分为两部，但后来《切韵》的麻韵则是分别来自歌部和鱼部。罗常培、周祖谟对上古韵部的分合以时代做了归纳，以下表1参考他们的分类：

表1：罗常培、周祖谟对周秦《诗经》音至两汉古音分部（局部）
（罗常培、周祖谟2007：14）



段玉裁将“家、华”归在鱼部，而“奇、为”归在歌部，可以知道段氏所建构的古音分部大约是反映西汉及之前的古音情况。下表是段玉裁古音十七部以后的韵类分化。

表2：古音十七部歌支鱼的分化关系



因《广韵》是官修的韵书，而且多参考《切韵》，采用旧文，因此被认为是反映隋唐的语音。从《广韵》到元代《经史正音切韵指南》，这几个韵部的格局大致没有改变，只有韵近的合并为一摄，现代对语音的探讨，也多从韵摄着手。

表3：各家对上古歌支的拟音

	高本汉		李方桂			董同龢		陆志韦		
韵部	歌	支	歌	支三	支四	歌	支	歌	支三	支四
上古	a	iek, iĕk, iĕg, ieg	a	jiaŋ	iaŋh	â	ja	ad	iaeg	iaeg
中古	a	jek, iek, iĕ, jĕ	â	jĕ	i	â	iĕ	ɒ	iei	iei

除陆志韦没有对上古音进行分部的工作以外，高本汉、李方桂、董同龢对上古音的分部皆为二十二部，不列支部，并入歌部三等韵，以支三表示，李方桂的支四“地”字则是后入至韵的上古歌支部字，段注《说文》将“地”归入十七部但又说明“地”字古音在十六十七部。也因为高本汉没有分出支部，从段玉裁支部字看高本汉的古音拟测，发现段氏支部字组在高本汉古音拟测有几种读音，约略可简化为jĕk和jĕg两种，在元音上做附加符号，主要是为了解释语音后来的分化，高本汉的j一般被认为就是半元音j，另外“地”字上古高本汉元音拟做ia。陆志韦没有对古音做分部，使用《广韵》206韵直接做古音的构拟。其次，董同龢所标记的j是指带有辅音性质的元音，可以理解半元音j，所以可以知道三等韵有j介音是高、李、董的共识，而陆志韦则认为是

顎音 i 。无论如何，半元音的 j 或纯元音的 i ，都可以确定前人所拟测的三等韵是带有一个顎音的介音。接着要说明的是，李方桂对同一韵，如歌部三等开口，对应中古分化成不同的读音，而做了不同的拟测，如“蛇” $*\text{djar} > \text{d}^{\text{z}}\text{ja}$ 、“移” $*\text{rar} > \text{j}^{\text{h}}\text{e}$ 、“皮” $*\text{bjar} > \text{bj}^{\text{h}}\text{e}$ 等等（李方桂2003：54），除了歌部，其他上古音部亦是如此。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因周朝韵文歌部与入声谐声关系，高本汉、李方桂和董同龢认为有部分歌部字收 -r 尾，收 -r 尾字非歌部全貌，故不列入表3的拟音当中。

除了上述四家的拟音，这里特别再加述王力的拟测。王力对上古音的拟测与上述四家不同的部分在于王力把周秦和两汉分开，认为周秦歌部是 ai ，两汉演变成 a ，而支部则一直都是 e 。然而他并没有解释歌部如何从舌面前二合元音 ai 变成后低元音 a ，亦没有解释上古关系密切的歌支在拟音上何以有相当的差距。由于王力歌部在上古切分了两个时代，各有拟音，所以没有放入上表一并对比。

除了王力的拟音，介音的有无是歌部与支部在拟音上最大的分别，其次是元音的高低。学者普遍认为歌部上古收A类低元音，支部李方桂、董同龢认为一样是收A类低元音，与歌部的分歧只在介音，高本汉则认为是 e 和 e ，陆志韦认为支部的主要元音是比 a 稍高的 æ 。不论如何构拟，都是为了要说明中古支韵的元音升高成 e 。支韵三等字在中古元音升高成 e 可以理解是顎音介音的同化。

表4：各家对《切韵》一等歌韵与二等麻韵在上古和中古的拟音

	高本汉		李方桂		董同龢		汪荣宝		林语堂		陆志韦	
韵部	歌	麻	歌	麻	歌	麻	歌	麻	歌	麻	歌	麻
上古	a	a	a	a	$\hat{\text{a}}$	a	a	a	a	a	ad	ag
中古	a	a	$\hat{\text{a}}$	a	$\hat{\text{a}}$	a	a	/			v	a

各家拟音大致相似，李方桂与董同龢的 $\hat{\text{a}}$ 元音属于舌面后低元音，因此可以看作是 a 。汪荣宝对歌麻上古音的构拟，只表示为 Y 音，符号标示 a 并无分前后或长短。林语堂认为上古歌为长音后 a ，麻为短音前 a 。陆志韦以周朝韵文歌部同 -d -g 尾收声字互谐的情况判定，上古歌部有辅音韵尾，汉朝时部分 -d -g 尾失落，到了《切韵》时期完全脱落。

排除辅音韵尾和元音长短的差异，单就在舌位前后的差异去看，李方桂认为上古歌麻都是前元音 a ，到中古始有分化，汪荣宝认为歌麻都是 Y 音，但不解释中古麻韵的演变，其余都一致认为上古歌主要元音是后低元音 a ，麻则是前低元音 a ，差异在于舌位的前后，故可相谐，又同时能够解释中古的分化。

三、方言的对应情况

引进方言时代层次概念是罗杰瑞1979年〈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这篇文章，认为闽语有三个时代层次：秦汉、六朝和晚唐，并以“天”字做分析：

表5: 罗杰瑞“天”字在闽语的三个时代层次 (Jerry Norman 1979: 271)

	秦汉	六朝	晚唐
将乐	ɕthāi	ɕthien	ɕthien
厦门		ɕthĩ	ɕthien
福州		ɕthien	ɕthien

罗杰瑞的方法是先进的, 但不免让人疑惑将乐与福州“天”读ɕthien何以来自六朝和晚唐两个时代? 对此, 张光宇在〈闽方言音韵层次的时代与地域〉文章中作了分析, 认为这是“层次重迭”的结果。²不论结果如何, 罗杰瑞所带来的研究方法开始被学界采纳和深入探讨研究。另外, 何大安对层次判断的看法是: “‘层次’的辨认有两条线索, 一是同一个词的异读, 一个是系统的不一致。”(丁邦新主编, 何大安2004: 14) 以下就以这两条线索, 加上韵书归类的层次, 去推测方言语音的演变路径。

(一) 它、蛇、虵、也: 许慎《说文》它: “蟲也”, 蛇: “它或从虫”(段玉裁2001: 684), “蛇”原是“它”的俗字, 两字段玉裁归为第十七部。其次关于“也”字, 许慎《说文》“也, 从乚象形乚亦声”, 段玉裁归入十六十七部, 另外《说文》乚: “读若移”段注: “移从多声, 在十七部, 亦用于十六部”(段玉裁2001: 633), “虵”是“蛇”的异体字, 不见于段注的《说文》, 但有收入在《集韵》和《广韵》之中。以上数据首先看到, 段玉裁肯定的把“蛇”字归在第十七部歌部, 而“它”字则有十六部支和十七部歌两读; 其次“蛇”字异体字作“虵”, 不免怀疑“蛇”字读音在某个时间或空间上与“也”字同音。

以下就以“蛇”和“也”两字的读音作讨论, “蛇”: 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列入支、歌(它“虵害人”)、麻(虵)韵; 《广韵》分别列入支、歌、麻、马(虵)韵; 《集韵》入支(蛇虵)、戈、麻、马韵。“也”: 《王韵》马韵; 《广韵》马韵, 《集韵》纸、马韵。如此见得, 排除声调的分别, “蛇”在中古至少有四种读法, “也”则有两种。于此可见, “也”和“蛇”的读音都有两个来源, 支部和歌部(麻亦来自歌)。罗常培、周祖谟也认为“蛇”字来自歌部和支部, “‘蛇’字在语言上代表两个词语, 一个是龙蛇的蛇, 一个是委蛇的蛇, 在西汉

² 张光宇, 1990, 〈闽方言音韵层次的时代与地域〉, 《切韵与方言》,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页180-181。“福州‘天’字无-ai (~aing) 一读, 可是同韵‘殿、垫’读-ai; 厦门方言‘天’字也无-ai, 可是同韵‘莲、前’读-ai (保存在地名‘莲河’和厦门市郊‘殿前’)。就‘天’字而言, 厦门、福州的-ai~aing显然是早被取代了。如果, 词汇证据(这是可能的)真足以支持将乐和福州二、三两层的分别, 从音韵的立场上看起来, 就得说明那是‘层次重迭’的结果。当罗杰瑞拿厦门的白读-i和福州的-ieng去构拟*-ian时, 事实上他的三层次就被压缩减成为两个层次了——将乐的-ai来自*-an。这个例子充分表明一个矛盾现象, 也是概念含混的结果。其实, 关于‘来源’形式的探讨应该分从两个角度去说明。就闽方言的立场说, 三个层次代表三个不同的来源, 三个不同来源成分不能说是两个来源, 此其一。就汉字音读的重建来说, 历史比较重建的结果只能有一个终极来源形式, 此其二。因此, 上述两个来源形式的结论, 即不符合音韵层次反映的闽方言形成和发展的事实, 也不符合历史比较重建的要求。”

都属于歌部。”“可是到东汉就不同了。凡是‘龙蛇’的字都属于歌部，‘委蛇’字都属于支部，分别画然，无一例外。”（罗常培、周祖谟2007：27）如此可知，“蛇”字确实有两个语音来源，以下再看方言对“蛇”字的反映。

北京的[ɣ]应来自麻韵的时遮切，山西汾西的[sɑ]，晋城的[ɣΛ]，祁县的[su]也可能来自麻韵，而闽南语的[tsua]可能来自于合口的戈韵，在闽南语中，假摄开口三等字今读为合口的也只有“蛇”字，其余同等地位的文字如“遮”[tsia]、“车”[ts'ia]，甚至是“蛇”字的文牍音[sia]都读为开口，至于闽北部分，松溪方言读[ia]，福鼎[sia]，福州[sie]，古田、宁德、周宁[sie]则可能来自支部但也可能是麻，留下面再做说明。除了“蛇”字，闽南方言中另保留一特殊例子可以凭吊的，是假摄开口二等麻韵字的“麻、沙”，“麻”字另有一批与其得声的文字可供对比，故后文再做讨论。而“沙”字闽南方言白读[sua]，《集韵》录其有支、戈、麻、禡四韵，而《广韵》只收入麻、禡韵，无支、戈韵。其中有个奇妙的一点是“沙”字在戈韵有两个反切，桑何切与蘇禾切，一般而言，在同一韵部有又音，理应是声母的差异，然“桑、蘇”都是心母字，故此二反切的差异自然在“何、禾”，不论《广韵》或是《集韵》，“何”皆在歌韵，“禾”皆在戈韵。中古各家对歌、戈韵拟音之差别，主要在于介音，如王力将歌韵拟做ɑ，戈韵拟做ua，是开合口的差别，与后来开合概念相符。上古韵部不分开合，自中古韵书始将开合分为两韵，那从古歌部的ɑ，到中古的歌韵ɑ、戈韵ua就只是中古审音更细，明辨开合之别，非音读之变，古音探讨似乎已经完结。但就现代方言来看，歌、戈读音开合纷乱，以北京方言来说开口的歌韵中“多、拖、挪、罗、左、我”都读合口，而合口的戈韵中“戈、科、讹、禾”都读开口，古音的不变难以解释如此之现象。因此若将起点拟做o当更容易解释现在的读音：

与中古韵书一致的音变路线

歌部	o	$\begin{cases} \text{歌韵“歌”} \\ \text{戈韵“过”} \end{cases}$	o（厦门文读[ko]）	>	ɣ（北京[kɣ]）
			uo（北京[kuo]）	>	ua（厦门白读[kua]）

与中古韵书不一致的音变路线

歌部	o	$\begin{cases} \text{歌韵“拖”} \\ \text{戈韵“和”} \end{cases}$	uo（北京[t'uo]）	>	ua（北京[t'ua]）
			o（厦门文读[ho]）	>	ɣ（北京[hɣ]）

“也”字在闽南漳洲有[a]和[ia]两读，山西“也”字有读[ia]音，王洪君认为是宋元白话的遗留，来自三等麻。音变形式可能如下：

“也”字

	上古	中古	今音
支部	ia	ie	i
麻	a	ia（麻三）	ie

“蛇”字 山西

麻三	汾西	晋城	北京	祁县
	a >	Λ >	ʏ >	u

“蛇”字 闽语

麻三	福鼎	福州	周宁
	ia >	iɛ >	ie

“也”字高本汉等多家上古音的拟测做ia，但得声偏旁牵涉其他等第的字，故上表只列主要元音a。支部所经历过的音变道路，麻韵也跟随，当中古支部读ie时，麻韵递补了ia的空缺，由此似乎也找到从麻得声的“靡”今读[_ɛmi]的原因。而“地”字中古入至韵，可能是受到声类定母的影响，音变步调比其他歌部字更快。另外，“蛇”字的两组例子，都属于元音高化，符合一般的语言规律，但山西“蛇”字三等麻韵i介音消失需特别做一说明。山西大部分方言同北京话一样，舌尖前辅音ts ts' s搭配舌尖元音ɿ与舌尖后辅音tʂ tʂ' ʂ搭配舌尖后元音ʁ时，后面不会再跟随其他元音或辅音，因此，原本应读为ʂ+ɿ+V的“蛇”字，ɿ或ʁ就消失，以符合当地的发音习惯，至于山西阳城“蛇”读ʂɿɛ可以证实原本“蛇”字应该有ɿ类元音。

从“蛇”字和“也”字的方音比较，发现“蛇”字读音来源自歌部或支部实际难以判断，因为语音的变化有其规律性，步调不一但路径相同，支部所经历的语音变化，歌部麻韵三等也跟着经历，因此，“蛇”字现今的读音来源，认为来自支部或是歌部都是可以解释的。另从方言的表现来看，支部的起点是a，而歌部的起点在o，若以现代语言的情况看，a和o的关系时常密切，如北京的“巴”[pa]在苏州、双峰读[po]，次方言里汕头的“闲”[ɔi]在揭阳读[āi]，这样的语言现象在其他语系中也有，如表示数字“八”在德文是acht，爱尔兰文是ocht，因此歌部和支部关系或许亦是如此。

（二）麻：在段注的《说文》当中，许慎表示从“麻”得声的有“糜、靡、摩”等，从“靡”得声的有“麾、磨”，“靡”从“麻”声，因此上列“糜、靡、摩、麾、磨”都可以认为皆从“麻”得声。段注将“磨”归在十四元部，其余都在十七歌部，“磨”归元部可能是刊刻错误，理应归于歌部。至中古《集韵》和《广韵》的反切，这一组字分别归在“支、戈、麻”韵里（包含相承的上去）。可知，上古从麻得声的一组字，在中古读音已有三分，而现代北京话亦能反映这三种读音。

- 来自“支”：糜、糜[mi]，麾[xui]
- 来自“戈”：磨、摩[mo]
- 来自“麻”：麻[ma]

根据各家的拟音，中古“支、戈、麻”就有开口和合口（有u或w介音）的分别，而现在从“麻”得声的字在各个方言读音也是开合不一。至于糜[xui]的声母是舌根擦音x，与其他字是唇鼻音m在发音部位与方法上有莫大的差别，董同龢所作的解释是，x来自清鼻音m̥，因为后面有u或w的影响才变成了现在的x。（董同龢1997：12）这是相当合理的解释，但本篇主要讨论韵部的演变，对于声母的谐声就不再做讨论。从北京音系的音读，还不足以描绘韵音分化的轨迹，需要再参考其他方言的语音材料。以下闽语材料根据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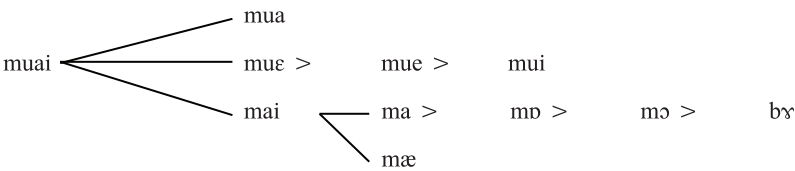
闽北	建瓯	陕阳	松溪	政和	洋墩	石陂	建阳	崇安
麻	mue	muai	mɔ	mue	ma	muai	ma	ma

闽北	邵武	光泽	泰宁	建宁	顺昌	将乐	明溪
磨~刀	mɛi	mai	mai	mɔ	ma	mæ	mue

尤溪县	城关	西洋	洋中	汤川	中仙	新桥	街面
糜粥	mue	mue	mui	mue	mue	mui	bɿ

首先须说明一点，尤溪县地处福建省中部，同时是闽方言五大分区的交界处，以东北为闽东方言区，以西属闽北方言区和闽中方言区，南部是闽南方言区，西南则是莆仙方言区。其次补充“麻”字厦门方言和潮州方言读muã。

“麻、磨、糜”在北京音系明确的分为三种读音，在闽语中关系却很模糊，“麻、磨”皆有a和ai的读音，“磨、糜”则皆有e的读音。戴黎刚认为歌部读uai是上古音的保留，并以王力的构拟*ai为凭据。（戴黎刚2012：20）以muai为起点也确实比较容易解释“麻”及从“麻”得声之字在闽语中的各种分化读音。



若以muai为“麻”的起点，分化将有三条路线，第一个是细音韵尾i脱落，第二种是二合元音ai合并成ɛ，第三种是唇辅音声母与u介音的相斥性而导致u介音消失。另外辅音声母b与m的关系在闽语相当复杂，“磨”字潮州方言就有mō, bua, bo三种读法，因此，街面方言“糜”读bɿ应该也是如此情况。

（三）罗：许慎《说文》在语音方面没有任何标记，段注《说文》将其归在第十七部，从罗得声的有“萝”字，许慎《说文》“从艸罗声”（段玉裁2001：35），段玉裁归在十七部。现今北京话“罗、萝、锣、箩”等以罗为声符的形声字都读[luo]。“罗、萝、锣、箩”四字，《广韵》皆作歌韵鲁何切，而《集韵》则入戈韵良何切，

段注与《广韵》同，作鲁何切。这里的疑问是，两部韵书都以“何”作切语下字，但却分作歌韵和戈韵，歌戈在语音上的差别是歌韵开口，戈韵合口。因此，如果按照《广韵》的格局对应现代语言，歌韵应该没有u介音，戈韵则有u介音，而实际语音并没有跟从《广韵》的音系规格。北京音开口“罗”和合口“骡”兼读合口[luo]，侯精一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报告》当中，山西42个方言点“罗、骡”同读，或开口或合口，如天镇方言“罗、骡”读[luʌ]皆合口，隰县方言“罗、骡”读[lɔ]皆开口，无一例外。“骡”，许慎《说文》作“羸，从馬羸声”，段注“洛戈切，十七部，今字作骡”（段玉裁2001：473）。另则，《切韵》不分歌戈有可能是上古歌戈原来不分的反映，此于前面讨论“蛇”字时，以歌戈韵中开合口不一致的北京和闽南语已有初步讨论。因此“罗、骡”的语音路线大约是，上古歌部，中古分作歌戈，近古又合为果摄，可知语音上必定是相近的，但开合口分与不分，还要再作探讨。另外，闽语语料缺“骡”，但有中古同“骡”音读的“螺”字，故以“螺”作对比。“罗、螺”在闽语普遍有读[lɔ]，但部分方言点有异读音，如“螺”建阳[sui]、松溪[suei]、沙县[sue]、福清[loi]、厦门、漳州各有两读[lɛ、lɔ]等。但因“螺”字不收入在《说文》，所以接下来主要还是以“罗、骡”作讨论。

延续前面的语料和韵书的对比，可以有两种猜测，其一，“罗、骡”从上古到中古有开合口之分，现代语音部份保留其分别，但大部分趋向合流。其二，“罗、骡”在上古不分，至中古开始分作开合口，但各个方言反映不一致。闽方言“罗”主要都读[lɔ]，变化不大，山西方言语料较为完善且差异较大，以下是山西方言“罗、骡”的音读：

表6：山西42个方言点“罗、骡”音读

音读	地区	音读	地区
lɔ	临汾、五台	luo	朔州、大同、沁县、霍州、运城、吉县、永济、平定
lu	临县	luʌ	天镇、平顺、晋城
lɤ	太原、太谷	luə	山阴、广灵、长治、长子、陵川、阳城、高平、闻喜、新降、石楼、五寨
lɔ	隰县	luɤ	万荣、代县、离石
luu	祁县、汾阳、汾西		
lɛ	岚县、孝义		
lɛ	忻州		
lei	平遥		
loi	文水		
lɤu	清徐		
lɔu	娄烦		

异读看似纷乱，但可以将读音相近的先归为一类，以方便做下一步讨论：

表7：山西方言“罗、骡”音读分类

大类	音读	大类	音读
lu	lu	luo	luo
lo	lo	luɣ	luɣ、luə
lɣ	lə、lu、lɣu、ləu	luʌ	luʌ
le	le、le、lei、ləi		

下面就分别开口与合口作为起点，读音的音变规律大约如下：



不管是以开口或是合口为起点，都可以解释山西方言现有的读音，但主要元音最早只能追溯到o，与各家对上古歌部和中古歌韵的拟音有出入。除了山西的例子，另外歌戈合流的情况在吴语中表现也特别突出。以下举代表开口的“歌”字及代表合口的“锅”字为例：

吴语	宜兴城内	金坛西岗镇	杭州城内	吴江盛泽镇	靖江城内
歌	ku	ko	kou	kɜu	kʌɣ
锅	ku	ko	kou	kɜu	kʌɣ

“歌、锅”二字在在北京话里依照古音开合口的分配读为[kɣ]与[kuo]，但在吴语当中，开合不分，表现完全一致，究其原因只能将之归于源头相同，故变化一致。

（四）果：在许慎《说文》当中从“果”得声的现今常用字有“裸、踝、颞、裹、课”，段玉裁皆归在十七部。《集韵》“果”分别收入在果韵和换韵，“裸”在换韵，“踝”在马韵，“颞”入缓韵和果韵，“裹”在果韵和过韵，“课”在戈韵和过韵。可知中古“果”得声的字涉及三类读音，除了阴声韵歌麻关系以外，还有阳声韵，但现今方言从“果”得声之字没有看到有收阳声韵尾的情况，因此，中古韵书中的切语是否是保留了上古歌部和元部阴阳对转的痕迹实难确定。

在北京音系当中“果、裹、裸”为一组读-uo，“颞、课”一组读-ɣ，“踝”自为一组读-uai。从前面“麻”得声之字的分析，-uai很有可能是“麻”声最早的音读，“踝”入马韵是否可以同样看待？《广韵》“踝”胡瓦切，是匣母字，以一般官话的语音演变规律来看，全浊上声今读去声，偶有读为阳上调，但“踝”字读阳平，

不符合一般规律。那现今“踝”读[_ɛxuai]的来源是否是胡瓦切，还值得再去商榷。由于方言材料的不足，“踝、裸”两字难以继续作进一步的讨论，以下只能接着探讨其余“果、裹、颞、课”四字。山西方言部分，《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只有“果、课”，《汉语方音字汇》中除了闽语，其他十六个方言点（北京、济南、西安、太原、武汉、成都、合肥、扬州、苏州、温州、长沙、双峰、南昌、梅县、广州、阳江）“果、裹”同音，“颞、课”同音。由于《汉语方音字汇》所收入的语料有限，每个大方言区只有两个方言点，实在难以做系统分析，故论文将只使用有四个方言点的闽语材料作探讨。

表8：闽方言厦门、潮州、福州、建瓯“果、裹、颞、课”音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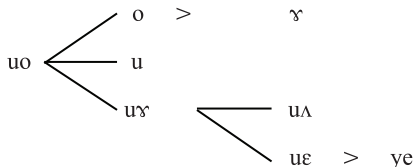
地区	果	裹	颞	课
厦门	¹ ko _文 ¹ ke _白	¹ ko	_ɛ k'o _文 k'e _白	k'o _文 k'e _白
潮州	¹ kue _文 ¹ kuẽ _文	¹ ko ¹ lo	¹ k'o ¹ lo	k'ue ²
福州	¹ kuo _文 ¹ kuei _白	¹ kuo _文 ¹ kuei _白	¹ k'uo	k'uo ²
建瓯	¹ kua	¹ ko _文 xo _白	_ɛ k'ua	k'ua ²

表9：山西42个方言点“果、课”音读

果	地区	课	地区
kuo	平定、朔州、大同、沁县、霍州、运城、吉县、永济	k'uo	平定、朔州、沁县、霍州、运城、吉县、永济
kuo	临汾	k'uo	临汾
ku	临县、汾阳、汾西	k'u	临县、汾阳、汾西
ko	祁县	k'o	祁县
kuɣu	清徐	k'uɣu	清徐
kuəu	娄烦	k'uəu	娄烦
kuɣ	太原、孝义、和顺、离石、代县、万荣	k'uɣ	太原、和顺、离石、代县
kuə	平遥、隰县、石楼、五台、五寨、山阴、广灵、长治、长子、陵川、阳城、高平、闻喜、新绛	k'uə	平遥、隰县、石楼、五台、五寨、山阴、广灵、长治、长子、陵川、阳城、高平、闻喜、新绛
kue	忻州	k'ue	忻州
kuɛ	孝义、岚县	k'uɛ	岚县
kuei	平遥、文水	k'uei	文水
kye	太谷	k'ye	太谷
kuɹ	天镇、平顺、晋城	k'uɹ	天镇、平顺、晋城
		k'ɣ	大同、万荣
		k'ə	广灵、陵川、阳城、高平

以上两表就“果”与其得声之字在南北方言的反映，发现了语音的一致性。北京音“果”与“课”属两读，排除辅音的送气与否和声调外，山西42个方言点几乎“果、课”同读，与中古《集韵》、《广韵》格局相同。至于闽方言，异读音看似杂乱，而实际却可以发现到“果、裹、颗、课”四字读音在闽方言的共同性。与山西方言一样，先排除辅音送气与否和声调相异的问题，厦门四字皆有-o的文读音，除“裹”字外皆有-e的白读音，福州皆有-uo的文读音，建瓯除“裹”字外皆有-ua的读音，潮州“果=课”，“裹=颗”分为两类。厦门白读音-e的层次大概与潮州-ue同层如“和”字潮州与漳州白读[hue]、厦门[he]，其音变模式大约是ue > e。山西方言与闽方言在这一部分例字都有出现文白异读的情况，文白差异在于文教推广，文读音传入而产生异读的差异，可视为一度语言接触而产生的音变。

将闽语和山西方言材料排列对比，发现“果”组字和前面的“罗”组字读音有相当的雷同，主要差别在于“果”组字大部分读合口，“罗”组字开合相当。差异的源头应是中古“罗”组字收歌戈韵，“果”组字只来自合口，然语音演变的情况两组字大致相同。



以上音变路线省略读音上近似的部分语音。发现“果”组的演变与“罗”组几乎相同，而稍微需要说明的是撮口呼-ye的出现，u与e皆属于高元音，从u到e是后圆唇到前展唇，其中过度的就是前圆唇高元音y，读音-ye因此出现。

四、结语

语音的演变一般有两种形式，音系内部的自然演变与语言接触而导致的突变。自然的演变一般是有规律和一致方向的渐变，从一个语言系统内部去比对就可以发现其演变的规律和步骤，而语言接触所导致的突变，往往需要与邻近方言去比对，才能掌握其演变的轨迹，语言层次问题油然而生。文白异读的文读音通过文教传入，部分字音会与原有的白读音并存，而文白竞争的结果，往往由文读音获胜。研究者一般只能从系统的一致性去判断文白，与系统音变规律一致的为白读，不一致的为文读。另外认为白读音是语言系统中较为古老的层次，文读音是新层次，但如果方言语音系统本身较为创新，后进的文读音却也可能反映更为保守的音读。就如同山西孝义方言“果”字kuɤ是文读kue是白读，与理应放映较古老的语音kuo相比，文读kuɤ是比较相近的。

由于语言接触的时间与次数无法掌控，文章只能以就有的全部材料去做对比，试图描绘语音的演变道路。从上古开始，歌部的演变与支部分而后合，其次原本来源于鱼部的麻韵字一度归入歌部，到中古又脱离，而开口歌与合口戈从中古韵书到现在方

言都无法截然划分。方音的比较只能以现一时间有限的材料，来推演到一定程度的古音，却无法完全窥视古音的全貌。

前面通过“也、蛇”方音的比较，分析出上古支部和歌部麻韵语音演变的微妙关系，支部在音变后麻韵递补支部语音的空缺，后又跟随了支部演变道路，属于语音上典型的“链移”。从这结果推测，歌支麻从上古至今语音交错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在“链移”过程当中，语音演变速度不一所造成。

其次，中古收支戈麻的“麻”组字，可追溯到最早的语音很有可能是主要元音为a的muai，从各家的构拟，歌部上古应是读舌面低元音A类，现代歌戈多读o，而麻韵由始至终都读A类，支部则是从低元音往高元音发展。“麻”组字复杂的音变道路完全对照出了支戈麻的音变路线，契合语音的构拟和实际的发展。

最后是“罗”组字和“果”组字的研究，不论是以开口或合口为起点，可追溯的最早歌戈韵主要元音是o。语料所看到的是当今的一个共时情况，而语音的演变从未停止，语音通过分析以描绘出来的音变道路只能作为参考对照，而非远古的实际情况。

五、资料

陈章太、李如龙，1991，《闽语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

戴黎刚，2012，《闽语的历史层次及其演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董同龢，1997，《上古音韵表稿》，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清）段玉裁，2001，《说文解字注》，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何大安，2007，〈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页11-21。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赵元任、李方桂合译，1982，《中国音韵学研究》，台北：商务印书馆。

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著，潘悟云、杨剑桥、陈重业、张洪明合译，1997，《汉文典》（修订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侯精一、温端政主编，1993，《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Jerry Norman 1979.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闽语词汇的时代层次），《方言》，第4期，页268-274。

Jerry Norman 1983. Some ancient Chinese dialect words in the Min dialect（闽语里的古方言字），《方言》，第3期，页202-211。

李方桂，2003，《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林语堂（林语堂），1923，〈读王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后〉，《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页465-474。

林语堂，1994，《林语堂名著全集·第十九卷·语言学论丛》，吉林：东北师范大学。

罗常培、周祖谟，2007，《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

陆志韦，1947，《古音说略》，北平：哈佛燕京学社。

虞万里，1994，〈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系及其演变〉，《音韵学研究》，第3辑，页265-291。

钱乃荣，1992，《当代吴语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福堂，2005，《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北京：语文出版社。

王福堂修订，2008，《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出版。

王洪君, 2000, 〈山西方言的“也[ia]似的”〉, 《语文研究》, 第3期, 页59-63。

王力, 1997, 《汉语语音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汪荣宝, 1923, 〈歌戈鱼虞模古读考〉, 《国学季刊》, 第1卷第2期, 页241-263。

张光宇, 1996, 〈论闽方言的形成〉, 《中国语文》, 第1期, 页16-26。

张光宇, 2003, 〈比较法在中国〉, 《语言研究》, 第23卷第4期, 页95-103。

赵诚, 1991, 《古代文字音韵论文集》, 北京: 中华书局。

周祖谟, 2005, 《唐五代韵书集存》, 北京: 中华书局。

数据库:

汉字古今音数据库,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和中央研究院信息科学研究所共同开发, <http://xiaoxue.iis.sinica.edu.tw/ccr/>, 阅览日期: 2020/04/19

教育部异体字字典, 中华民国教育部, <http://dict.variants.moe.edu.tw/>, 阅览日期: 2020/04/19